

目 录

 从 前 CONGQIAN 万人如海一身藏 WANREN RUHAI YISHENCANG	四位先生 / 老舍	1
	忆西谛先生 / 吴晗	5
	郑振铎先生的“书癖” / 许觉民	9
	我与老舍 / 罗常培	12
	老舍先生二三事 / 梅林	15
	我与老舍与酒 / 台静农	19
	打屁股	
	——忆老舍 / 端木蕻良	22
	怀念老舍先生 / 新风霞	25
	花之路	
	——纪念妈妈胡絮青 / 舒乙	30
	我师夏衍 / 黄宗江	35
	忆赵朴初在“文革”岁月中 / 袁鹰	39
	走近施蛰存先生 / 徐芳	46
	高风千古仰斯人	
	——缅怀施蛰存先生 / 刘梦芙	52
	他在天国看风景	
	——悼卞之琳先生 / 桂苓	57
	傅雷二三事 / 刘海粟	60
	记傅雷 / 杨绛	72
	傅雷：人格永恒的美 / 黄宗英	77
	难以走出的雨巷	
	——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 / 李辉	80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 谢冕	92

虽曰末学：怀静农师二三事 / 郑再发	95
清风明月，高山流水	
——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 吴组缃	99
追忆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作文之道	
——为悼念平伯师而作 / 吴小如	102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 叶兆言	107
忆俞平伯 / 黄裳	110
俞平老的“书生气” / 朱寨	119
故人书简	
——怀念叶圣陶 / 黄裳	122
一死一生见交情	
——记沈从文 / 麋华菱	131
沈从文晚年口述 / 王亚蓉	136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 陈徒手	143
怀念丰子恺先生 / 刘海粟	153
父亲雪峰 / 冯夏熊	156
冰心女士访问记 / 子冈	160
高墙内外的胡风与我 / 梅志	168
遥寄张爱玲 / 柯灵	184
“余霞散绮，向烟波路”	
——送柯灵先生远行 / 康金海	191
悼念柯灵 / 曾敏之	194
悼念楼适夷先生 / 舒芜	197
乘风破浪的旅程	
——怀荒煤 / 林非	202
怀念曹靖华先生 / 魏荒弩	206
敲门 / 邓伟	210
守望在人生的边上 / 施亮	214
京城吴家的家风和校风 / 吴徠	227
吴祖光最后的日子	
——女儿吴霜回忆父亲 / 颜蓓	232
我心中的吴祖光 / 杜高	237
道别	



——忆父亲萧乾弥留之际 / 萧桐	241
记叶灵凤 / 刘以鬯	248
漫忆汪曾祺 / 邓友梅	255
纪念汪曾祺 / 巫宁坤	262
清谈汪曾祺 / 桂苓	266
音乐人生 / 桂苓	269
短巷情长	
——记父亲臧克家和赵堂子胡同老街坊 们 / 臧小平	273
沈从文与丁玲恩怨沧桑 / 李辉	279
挣扎在男人的世界的丁玲 / 夏逸陶	285
北京城里北京人：收拾残片	
——陪海音先生再走城南 / 傅光明	288
另一段城南旧事 / 余光中	293
怀念罗荪 / 丹晨	297
荷香深处祭文魂 / 从维熙	302
怀念孙犁先生 / 铁凝	309
看望孙犁先生 / 彭荆风	315
忧郁的孙犁先生 / 肖复兴	319
寂寞也是一种境界 / 罗雪村	323
倏忽人间四月天	
——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 梁从诫	326
才女林徽因 / 萧乾	329
怀念林徽因 / 何向阳	331
忆韦君宜 / 许觉民	338
忆徐訏 / 刘以鬯	342
记赵清阁 / 刘以鬯	347
夏志清传奇 / 刘绍铭	351
翻译家草婴其人 / 高莽	355
好人冯牧 / 李子云	364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 严文井	372
梁宗岱和沉樱最后的遗憾 / 佚名	378
孙姨和梅娘 / 史铁生	384

复旦名师 / 许道明	388
灵地缅想胡河清 / 刘琅	393
大荒中的苦吟与圣咏 ——纪念昌耀先生 / 沈苇	396
暮春时节的雷雨 / 王晓明	400
诗人之死 / 耿立	403

四位先生

老舍

吴组缃先生的猪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否则就大不好意思了。一进门,我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我心里一想,便想到了小花猪。假若小花猪丢了,或是出了别的毛病,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一打听,果然是为了小花猪:它已绝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张给它点奎宁吃,恐怕是打摆子。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一觉,出点汗也许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大家还是不赞成。后来,把猪医生请来了。我颇兴奋,要看看猪怎么吃药。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使小花猪横衔着,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这样,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把药包儿束好,小花猪的口中好像生了两个翅膀,倒并不难看。

虽然吴宅有此骚动,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劲儿!过了两天,我又去看小花猪——这回是专程探病,绝不为了看别人;我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而且也吃点东西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并且提出声明:到冬天,得分给我几斤腊肉;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吴太太说:“几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听罢,都出了冷汗!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

来重庆,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有的说也罢,没的说也罢,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假若不是别人都困得不能出声了,他还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谈,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表、月亮、太阳,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时间。

比如说吧,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宗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点吃饭。早回来呀!”大家告诉他。他回答声“一定回来”,便匆匆地走出去。

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即使不是这样,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十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或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见某种新东西,他得过去问问价钱,不管买与不买。看到戏报子,马上他去借电话,问还有票没有……这样,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所以只走两三个钟头,到了开会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经散了会,他也得坐两点钟,他跟谁都谈得来,都谈得有趣,很亲切,很细腻。有人刚买一条绳子,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五十岁了啊!七点,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归路上,又照样的劝架,救人,追贼,问物价,打电话……至早,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满头大汗,三步当作两步走的。他走了进来,饭早已开过了。

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门,你何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

姚蓬子先生的砚台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

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地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周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视台！

何容先生的戒烟

首先要声明：这里所说的烟是香烟，不是鸦片。

从武汉到重庆，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到前年八月间。在武汉的时候，我们都吸“大前门”或“使馆”牌；大小“英”似乎都不够味儿。到了重庆，小大“英”似乎变了质，越来越“够”味儿了，“前门”与“使馆”倒仿佛没了什么意思。慢慢的，“刀”牌与“哈德门”又变成我们的朋友，而与大小“英”，不管是谁的主动吧，好像冷淡得日悬一日，不久，“刀”牌与“哈德门”又与我们发生了意见，差不多要绝交的样子，何容先生就决心戒烟！

在他戒烟之前，我已声明过：“先上吊。后戒烟！”本来嘛，“弃妇抛雏”的流亡在外，吃不敢进大三元，喝么也不过是清一色（黄酒贵，只好吃点白干），女友不敢去交，男友一律是穷光蛋，住是二人一室，睡是臭

虫满床，再不吸两枝香烟，还活着干吗？可是，一看何容先生戒烟，我到底受了感动，既觉自己无勇，又钦佩他的伟大；所以，他在屋里，我几乎不敢动手取烟，以免动摇他的坚决！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个钟头，一枝烟没吸！醒来，已是黄昏，他便独自走出去。我没敢陪他出去，怕不留神递给他一枝烟，破了戒！掌灯之后，他回来了，满面红光，含着笑，从口袋中掏出一包土产卷烟来。“你尝尝这个，”他客气地让我，“才一个铜板一枝！有这个，似乎就不必戒烟了！没有必要！”把烟接过来，我没敢说什么，怕伤了他的尊严。面对面的，把烟燃上，我俩细细地欣赏。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我以为他误把爆竹买来了！听了一会儿，还好，并没有爆炸，就放胆继续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我看见蚊子都争着向外边飞，我很高兴。既吸烟，又驱蚊，太可贵了！再吸几口之后，墙上又发现了臭虫，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兴了！吸到了半支，何容先生与我也跑出去了，他低声地说：“看样子，还得戒烟！”何容先生二次戒烟，有半天之久。当天的下午，他买来了烟斗与烟叶。“几毛钱的烟叶，够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烟呢！”他说。吸了几天的烟斗，他发现了：

（一）不便携带。

（二）不用力，抽不到：用力，烟油射在舌头上。

（三）费洋火。

（四）须天天收拾，麻烦！有此四弊，他就戒烟斗，而又吸上香烟了。

“始作卷烟者。其无后乎！”他说。

最近两年，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烟了，而指头上始终是黄的。

忆西谛先生

吴晗

西谛先生离开我们三周年了，他那天真的面容，爽朗的笑声，历历如在目前。

我和他相识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念书，他是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在清华兼两点钟课，我听了他的课，从此便相识了。

西谛先生那时候已经出版了他所著的文学史，和鲁迅先生合作搞笺谱，名气很大。但是，他从来没有架子，既没有我们清华某些镀过金的洋教授威风，也没有那时候社会上有些自命为大学者的不可一世的神气。他和蔼可亲，谈话时总是笑，特别对青年人，只要有一长可取的，便加意鼓励，总是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这两句话，后来竟成为他的口头禅。在他逝世前不久，在缅甸国庆的酒会上，他、夏衍同志和我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因为前些日子我发表了《变烟草》一文，夏衍同志也发表了谈花草果木的文章，谈话自然地集中在这个方面，西谛先生在谈话中又接连地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我们还故意和他开玩笑。谁知道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呢！

我是他的学生，可是他从不以老师自居，而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待我。

1933年秋天，西谛先生创办《文学季刊》，约了几个人做编辑，我记得其中有巴金、冰心、朱自清等人，我那时才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因为经常在《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写些文章，也把我约上了，大家一谈，都很赞成，刊物便办起来了。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他也夸奖说：“好极了！好极了！”相反，清华的有些教授看了，却不大以为然。有一个老教授曾对我说：“你研究《金瓶梅》，讲清时代也就算了，何必讲时代背景呢？”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话里有话，原来那个时代是不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但不许讲，连时代背景这类也是忌讳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我是个穷学生，无事不进城，有事进城，也上不起饭馆吃饭。有一次

进城,办完事,等回校的公共汽车,在东安市场旧书摊徘徊,忽然碰见西谛先生,他也在买旧书,一见面便问:“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请我到五芳斋吃饭,记得这次吃了鲥鱼,是生平第一次。两人边吃边谈,天南海北,谈得没个边。从此便越发熟了,见面无所不谈了。

过了几个月,西谛先生离开燕京,到上海去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开学。我先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后来又回到清华,长住昆明,和西谛先生的来往便中断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蒋介石政府连战连败,对敌屈辱,一味退让,对内却磨刀霍霍,掀起几次反共高潮,和全国人民为敌的丑恶面目逐步暴露的时候,我们在昆明创办了《民主周刊》,西谛先生在上海也创办了《民主》。道路相隔几千里,却不约而同,在两个地方同时办了反蒋介石、呼吁民主、要求和平的刊物,我和西谛先生虽然没有通信,这两个刊物却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了,三校师生都复员北上,我也取道上海回到北平。一到上海,首先去拜访西谛先生,一见面高兴极了,除了叙述日伪统治上海时期,他的困难遭遇以外,还谈了当前的工作。他说《民主》不准备再办下去了。要取得民主,实现和平,得采用另外一个方式。他已经参加了民主促进会,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此外,在学术工作方面,他正在编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几十年来搜集了不少资料,要做一个初步总结,便利研究历史的人们。他的书房里,书都让了位了,一格格摆满古代陶俑,主要是唐代的陶俑,有几个特别精美的三彩陶俑。他又指着连声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为了购买这些陶俑和必要的资料,他欠了不少债。在编辑过程中,他自己奔走,请人照相,自己动手剪贴资料,写说明,一个人单干,他说:“这是手工业方式,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说了又笑了,接着又谈到在抗战前,他曾特地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了傅斯年,要求看一看殷墟和其他考古资料,谁知道竟被一口拒绝,不能看,“你看,发掘经过多少年了,自己不研究,也不许人家研究,不止是资本垄断了,连学术也垄断了。这就是国民党!不如此又怎么叫国民党呢?”说时很气愤,说完,他又笑了,接着说:“总有这一天,这些被长期封存在库房里的资料会重见天日的,会有这一天!”我说:“是的,不要很久,会有这一天。”

也正在这时候,国民党通过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用美国飞机、美国军

舰运输国民党军队，源源北上，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和军事进攻相配合的是政治恐怖，7月11日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接着在15日又暗杀了闻一多。形势很紧张，我在上海，和同志们一道，参加了反蒋、反内战的斗争，到同济大学、大同大学、中教联，小教联做报告，欢送到南京请愿的代表和游行，西谛先生再三告诉我：“要警惕啊，提防有尾巴！”并且详细描述了自己上海多年来和特务斗争的经验，他对这些人，也有一句口头禅，那就是：“坏极了！可恶极了！”西谛先生的爱和憎是非常分明的。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来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们一道进入解放区，不料当天报纸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有一次，他陪我买一支自来水笔，铺子里问要不要刻名字，我说要，提笔刚写了“吴”字上半的“口”字，西谛先生立刻抢笔过去，代我写了“辰伯”二字，还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怪我太粗心了。

他知道我在等待机会进入解放区，又不能出来活动，十分无聊，就把他编辑的《玄览堂丛书二集》和《明季史料丛书》送给我，要我宁可在家读书，不可出门。通过他，叶圣陶先生、周予同先生、王伯祥先生还陪我逛了一趟苏州。

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我回到了北平。不久，西谛先生也到北平来了。久别后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同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晚上，大家谈得高兴，一瓶酒喝完了，又到外面买了十斤酒，统统喝光。

此后，见面的机会多了，谈天，访古，买旧书，经常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寻找明景泰帝的坟墓，我们两人在西郊南郊找了一天，后来毕竟在颐和园附近找到了，重新修缮，建为公园。记得有一次一起到琉璃厂，赵万里先生也同去，看到一本好书，赵先生要替北京图书馆买，西谛先生也抢着买，结果还是被西谛先生买了。他对旧书是有选择的，第一要插图本，第二是有关戏曲的，第三是小说，只要有他所没有的，便千方百计想法买，价钱贵一些也不在乎，以此，不少爱买旧书的朋友们，对他颇有些意见。他也知道朋友们有意见，笑着对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以后还不是国家的。”果然，他逝世以后，全部藏书一万五千多种都归了北京图书馆。

他藏书之多，我是知道的，这些年来，他收到一些好本子，也经常找

我欣赏。但是，他住的地方并不宽敞，除书架上的书以外，大部分都装在箱子里，并且还有一部分寄存在上海。最近读了他的《西谛书目》共27册，没有分类，是找人按撰书的地方和书籍藏书编列的，题签《西谛书目》是他的亲笔，中间也有个别地方经他改动。细读之后，才知道他的兴趣很广。藏书中主要类别有戏剧、小说、画谱、宝卷、弹词、考古、金石、文集、诗集、词集、目录、方志、丛书等等，而以戏剧、小说、插图本书为最精。除此而外，他也注意社会经济史料，例如抄本的《光绪十九年嵊县保甲烟户丁口册》、《贵阳府属道里册》《都匀府亲辖村寨道里册》、《平越府属、梨平府属物料价值》和刊本的《北新关商税则例》、《闽海关常规则例》、《同治十年广和号刊丸散膏丹集录》等等。这一万五千多种书，是他一生节衣缩食，四处搜访，集一生精力得来的。他为国积累了这笔财富，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贡献。

三年前，在缅甸使馆酒会之后，知道他出国去了，也和往常一样，以为不久可以回来。谁知不多几天后，在北京车站上，碰见夏衍同志，他容色惨白，低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振铎死了。”我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时被这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见报，才知道飞机失事的详情。三十年的老师和朋友，就此永别了！经常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关心我、鼓励我的同志，就此永别了！

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也参加了送葬行列，送到墓地，眼看他骨灰下葬。但是，纪念文字总是写不出来。因为一提笔就难过，就流泪，写不下去。这么一个体格健壮，永远乐观，生龙活虎般的人，怎么能忍心写他死去呢？三年了，我没有写文章。

我每一次进历史博物馆，总是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我每一次参观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也不由不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同样，我每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收藏家捐献给国家名贵图书和器物的消息，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西谛先生，你的藏书已经成为全民的财产了。你的未竟的事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继承着。我想，你要是知道了，也还会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的。我们就此告慰你在天之灵吧！

郑振铎先生的“书癖”

许觉民

振铎先生对中国古文学的造诣和文物知识的渊博素为人知,此外他于重印古籍设计的精细功夫也独有一番创造的心思。《西谛书话》中有《谈印书》一文,专门说了不少对重印古籍独有的见解。不过倘不经过和他亲自交往,他的那种处事方法之严谨与精到的工力就不会有深切的印象。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提名中有中国的屈原,这就要迅速将《楚辞集注》这部古籍赶印出来。出版社商之于振铎先生,他毫不犹豫地力主要将这部书印线装本,并提出还应印线装本《楚辞图》。关于印图谱的事,他一向认为除书之外,也要重视图。《西谛书话》中有云:古人“素不重视图谱,后世艺文之目,自隋唐以下,递相因习,故古人之图,日益亡佚而无纪。”这是他最感到惋惜的。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有文有图,可谓别树一帜。文学史著作中有了插图,固属罕见,其实适足以帮助读者增加文学史实的印象。那一次印《楚辞集注》和《楚辞图》,出版社原拟一般的照相影印,振铎先生以为不妥,力主非用珂罗版印刷不可。出版社悉从他所议,他于是亲自向北京图书馆商调二书的善本。北京因无印珂罗版之设备,他又写介绍信由出版社到上海去印制。出版社派了我和文怀沙先生两人去上海督印监制。两部书印得古雅,书函端庄。又商请沈尹默先生为两书题写书名,由此益见其清奇夺目。这两部书于1959年均得莱比锡书展的金质奖章。

由此次的印书,使我想起抗日战争结束后,振铎先生在上海亲自督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诸要籍,这是他多年蒐集所得而编成的两部图像,印数无多,以后就未见再印,向隅者未能购得,至今有人说起,犹引为憾事。

至于振铎先生藏书之丰,尤其是古版珍本线装书,是藏书家中所罕有的。他对书之癖好,嗜之如命。为寻觅他所向往已久而不可得的书,真似思之心切,如摧心肝,一旦有了消息,往往寝食俱废,非得之而不罢休。

他在《蛰居散记》一书中曾提到在“孤岛”困居期间，为寻求旧山楼所藏元杂剧的经过，“耿耿不忘于心，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元剧，必及此书”。虽然最后经过种种周折和困难终于侥幸购得了此书，欣喜地将之捧了回来，然而得之时几乎被人抢先，千钧一发，机会稍纵即逝，可谓幸运矣。

1951年，他为抢救可能失落于海外的一批古籍善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他得悉宝礼堂主人潘明训先生的藏书的情况，在战争期间，潘家家属生怕战争的影响可能造成藏书散失，遂秘密迁藏于香港，这消息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振铎先生于1951年听到这消息，十分忧虑这批善本流向海外，他知道内中有宋版善本一百一十部，元版善本六部，此项国宝倘若流失于他国，损失将难以挽回。不久后又得悉美国人愿出五十万美元收购这批书，这一回非同小可，如真被收购，要想追回是万难了。振铎先生迅即与香港潘家联系，难得的是潘明训的后代潘世兹先生深明大义，给振铎先生写来了一信，表明决不售与美国人，愿将藏书无偿地献给祖国。振铎先生获悉后惊喜交集，立即复信勉励，并报告周恩来总理，接着立即办理这批藏书运回北京的事宜，运回后归北京图书馆珍藏。

振铎先生自幼家境清寒，成人后或教书或当编辑，同时靠写作收入维持生活。他自青年时起，就嗜书如命，尤对古籍中的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方面的好版本，倘有发现，不惜倾其囊而得之。他在《永在的温情》一文中自况：“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手臂。”此中辛劳，道出了一个学者在困苦中生发出来的对书籍爱好的一片至诚至情。他的藏书，虽为自己研究之用，但到底也是为了保存而留给后世之用，最终这批藏书也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振铎先生不独爱书，他编书也有自己的独创性，30年代他主编《世界文库》，每册收有中外文学名著十余种，采取的是分章连载之法，每册可看到作品之若干章，续文则在下册连续刊出时再见，几乎是用杂志形式刊出的文章，共刊行了十二巨册，倘排列在一起，俨然是一大部皇皇巨帙，蔚为大观。凡持有全书的，数十种中外文学名著尽在握中矣。

不过他的爱书之心也有过挫折，那就是在“孤岛”时期，为生计所迫，他平素既无积蓄又无进益，一家数口要生活，不得已只有卖书之一途。他的家人在叙述他卖书前的情景十分凄楚：“……每逢卖书的前夜，

在小楼上昏暗的灯光下,他默默地打点着一捆捆明天就要离他而去的书……他深情地望着,抚摸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心爱的书,如同要和亲人诀别时一般,心如刀绞,但不卖又拿什么来换米呢”?那年头真是风雨如晦,他一面受贫穷熬煎之苦,一面还要躲避敌寇的追查。他经常不敢住在家里,另在一条冷僻的居尔典路上租赁一间小屋蛰居。但是生活的逼迫又使他不得不出而谋生,除卖书外,他还与翻译家耿济之先生在沪西住宅区合办了一个小小的旧书店,租的似乎是一个原来的汽车间,陈列的旧书,一半是振铎先生藏书中可以出让的一部分,济之先生则将不甚急需的外文图书搬来了不少。他们找了一个人看店经营,无奈地处偏僻,又无广告,生意一直清淡,经常门可罗雀,偶有点生意,支付房租和看店人的工资尚且不敷,不久也只得歇闭了。那几位文学界前辈,在那个年代备受贫困的情状,实在不堪言说。

抗战结束后,振铎先生八年的蛰居生活终于过去,他神采迥异地投入了工作,创办了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又与马叙伦先生等创办了呼吁停止内战、推进民主运动的《民主周刊》,还亲自编印多种中国历史图案,撰写《蛰居散记》等书,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活跃异常,由此也显示了他从事多种文化活动的卓越才华和风貌。

1958年10月,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至今已四十三年。他一生的经历,可述之事甚多,就以他与书的缘分与癖好之一端而言,即可看出他的素养和品德之一斑。书和人息息相关,人著述书,人珍贵书,于是文化存,振铎先生于此是极好的表率。

我与老舍

罗常培

三十五年前，北平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小学堂里有两个个性不同的孩子：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由这点禀赋的差异便分歧了我和老舍一生的途径。

三年小学，半年中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差别越发显著了。自他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宣讲所里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十七岁毕业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三年考绩，品第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后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我这时刚在中学毕业，迥隔云泥，对他真是羡慕不置！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涉世几年的经验，使他格外得到证明，他再不能随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魉周旋了，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宁愿安贫受窘去过清苦生活。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是取材于这个时候的见闻。

离开小学校教育界后，他便在顾孟馀先生主持的北京教育会作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任两小时国语，每月收入四十几元，抵不上从前的三分之一。但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除奉母自贍以外，还要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一晚我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会所去看他，他含泪告诉我：“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制寒衣和米面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

“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这时檐前铁马被带哨子的北风吹得丁当乱响，在彼此相对无言的当儿便代替了我的回答。

假若我再泄露一个秘密，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后来所写的《微神》，就是他自己初恋的影儿。这一点灵感的嫩芽，也是由雷神庙的一夕谈培养出来的。有一晚我从骡马市赶回北城，路过教育会想进去看看他，顺便也叫车夫歇歇腿，恰巧他有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没有发，信里有一首咏梅花诗，字里行间表现着内心的苦闷。（恕我日记沦陷北平，原诗已经背不出来了！）从这首诗谈起，他告诉了我儿时所眷恋的对象和当时情感动荡的状况，我还一度自告奋勇地去伐柯，到了那儿因为那位小姐的父亲当了和尚，累得女儿也做了带发修行的优波夷！以致这段姻缘未能缔结——虽然她的结局并不像那篇小说描写得那么坏。我这种歉仄直到我介绍胡絮青女士变成舒太太的时候才算弥补上了。

他开始创作是到伦敦以后的事。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脱稿后，立刻寄给我 and 亡友白涤洲看。我又把它转呈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很想拿它去出版，结果却被郑振铎拉到商务去了。

我本不是作家，老舍叫我审阅他的稿子未免问道于盲。记得我当时由直觉得粗浅印象是思想没有哲学基础，行文中加括弧解释的地方太多。后来接到他的回信。对于后一点未置可否，对于前一点却说：“迭更司又有什么哲学基础来着？”

《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分期发表后，因为语言的流利，风趣的幽默，描写的生动，讽刺的深刻，在当时文坛上耳目一新。颇为轰动。不久，合印成书，销路畅旺，称得起脍炙人口。接着《赵子曰》和《二马》相继问世，老舍遂在“幽默大师”还靠着语音学吃饭的时候（跟我现在一样！），业已因突梯滑稽名满天下了。

《小坡的生日》，是回国前在新加坡写的。到齐鲁大学教书后，他曾写了一部很得意的《大明湖》，不幸随着“一二八”的炮火化成灰烬了！几个短篇的集子都是到青岛以后才写的。此外，像《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长篇都是住在济南和青岛两个地方写成的。这几部书的原稿我已经没有先睹为快的眼福了。但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却是拿我做题材的，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